

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

周 琇 環

摘 要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面臨著西方國家強力的挑戰，當時的啓蒙人物最迫切關懷的事情，即如何變法自強，如何為國家找出路、為民族求生存，以及如何立足於國際社會之中，因此，民族主義遂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思考的方向之一。

清末啓蒙人物中，以王韜的民族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但是首先主張廢除「領事裁判權」者；是倡行主權民族主義的先導；是最早提出君主立憲制主張的人；也是1860年代第一個提出經濟民族主義的學者。因此，王韜不但啓發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對於中國人的民族觀、族國觀、世界觀、國際觀之形塑都曾發揮過相當的貢獻與影響。

歷來學界對王韜的研究，可以說是成果豐碩。其中美國學者Paul A. Cohen（柯保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乙文，係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探討王韜對時代思想的啓發者。該文藉由王韜寓港旅英後的經歷與著作（如《普法戰紀》等），從富強觀、主權論、商力說、道器說等方面論述王韜在中國早期民族主義思想中的地位與影響。但對於王韜寓港前由族類民族主義轉變成為主權民族主義的過程，以及寓港後所提出額外權利、主張君主立憲等創新想法，未能論及。

故而本文針對王韜一生的經歷，自其族類思想、愛國忠君思想，以至於主權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君主立憲制、文化混同觀等項目，再次且全面地討論處身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下，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之演變過程、思想精義，以及其對老舊的中國社會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關鍵詞：王韜、墨海書館、循環日報、民族主義、領事裁判權

The Nationalism Ideas of Wang T'ao

Hsiu-huan Chou*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faced new challenges from Western powers. Many intellectuals of Ch'ing dynasty were urgently concerned about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so as the nation could survive from the challenge and become strong again to stand with the powers. As a result, Chinese nationalism came into being.

Wang T'ao's nationalism wa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time.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propose the abolishment of "consular jurisdiction," to advocate "sovereign nationalism," to present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put forth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1860's. Thus, he not only initiated Chinese nationalism but also helped to shape many related concepts—ethnic view, national-ethnic view, cosmopolitanism, etc.

There has been abundant research on Wang T'ao. For instance, Paul A. Cohen's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is a good study. It discussed how Wang developed his nationalism,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his experience in England (e.g., *Notes on the P'u-Fa Chan-chi*), and how his ideas on national strength, sovereignty, commerce, etc. influenced the nation. But it does not discuss how Wang changed his ethnic nationalism into sovereign nationalism, and why he proposed extraordinary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fter he returned from England.

This is what the paper wishes to deal with. We would like to investigate how Wang T'ao, throughout all his life, managed to shape his idea of nationalism—one fused with ethnic thoughts, loyalty, sovereign nationalis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how his thoughts shook and influenced "the greatest change in thousands of years."

Key words: Wang T'ao,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Daily Newspaper in Hong Kong, Nationalism, Consular Jurisdiction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

周琇環**

壹、前言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面臨著西方國家強力的挑戰，當時的啓蒙人物最迫切關懷的事情，即如何變法自強，如何爲國家找出路、爲民族求生存，以及如何立足於國際社會之中。因此，民族主義¹遂成爲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思考的方向之一。

依據前人的研究，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有的學者認爲係肇始於王夫之（1619-1692）的族類思想，將自強運動期間的知識分子王韜（1828-1897），則視爲文化的民族主義者。²另一派學者認爲，1840年主權觀念產生之後，中國的近代民族主義才告形成，而所謂主權觀念係由王韜、鄭觀應等時代先驅人物所提出。³第三派學者主張，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係發軔於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孫中山發動首次革命之後，從那個時期開始，大多數的近代中國知識分

* 本文修改期間，承蒙師大李國祁教授及《國史館學術集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特致謝忱。

** 國史館協修

¹ 西方nationalism乙詞，可譯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主義」、「國族主義」、「族國主義」，係隨當事人主觀善變的意理系統而來，本文採其廣義的定義，而不從其複雜的意理爭辯。其間的差異與意涵的演變，可參閱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1年，3版），頁9-21；朱宏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第30卷第2期（1992年6月），頁7-38。

² 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頁24-26。

³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71年，三刷），頁211。

子，才開始深入瞭解西方。⁴

但若是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構成要素與內容論，亦即由族類、文化、主權⁵、經濟⁶等四個面向來看，清末啓蒙人物中，應以王韜的民族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但是首先主張廢除「領事裁判權」者；⁷是倡行主權民族主義的先導；⁸是最早提出君主立憲制主張的人；⁹也是1860年代第一個提出經濟民族主義的學者。¹⁰而王韜不但啓發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¹¹對於中國人的民族觀、族國觀、世界觀、國際觀之形塑亦有相當的貢獻與影響。

歷來學界對王韜的研究，可以說是成果豐碩。根據2003年高美芸撰〈王韜對時代的關懷及其尋求的解決之道〉乙文的統計分析，以王韜為研究取向的單篇論文數量，自1934年至2002年間累積達174篇，1973至2003年相關的專書論著有10冊。其中美國學者Paul A. Cohen（柯保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乙文，曾藉由王韜寓港旅英後的經歷與著作（如《普法戰紀》等），從富強觀、主權論、商力說、道器說等方面，論述王韜在中國早

⁴ Paul A. Cohen（柯保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August, 1967）, pp.559,573.

⁵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228。

⁶ 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頁19-43。

⁷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212；Paul A. Cohen，“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August, 1967）, p.568.

⁸ 瞿立鶴：〈近百年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之起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8編近代思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5月），頁361。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212，認為清季提出主權觀念的先驅，有王韜、鄭觀應、黃遵憲、曾紀澤、何啟等五人。

⁹ 忻平：〈中國最早提出君主立憲制的是王韜〉，《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1983年第6期。

¹⁰ Paul A. Cohen，“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August, 1967）, p.569.

¹¹ 瞿立鶴：〈近百年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之起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8編近代思潮，頁361。

期民族主義思想中的地位與影響。¹²但對於王韜寓港前由族類民族主義轉變成爲主權民族主義的過程，以及寓港後所提出額外權利、主張君主立憲等創新想法，著墨不多。

故而本文針對王韜一生的經歷，自其族類思想、愛國忠君思想，以至於主權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君主立憲制、文化混同觀等項目，再次且全面地討論處身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下，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之演變過程、思想精義，以及其對老舊的中國社會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貳、王韜的生平及其民族思想的形成

王韜，學名利賓，字蘭卿。清道光8年（1828），生於江蘇省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今江蘇省吳縣甬直鎮）。¹³18歲（1845）考取新陽縣縣學生員後，易名瀚，字懶今。¹⁴

道光26年（1846）參加鄉試落第，遂專心致力於經史。¹⁵道光28年（1848年2月）至上海探望他在教書的父親時，曾參觀使用機器印刷書籍的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結識該館創辦人英國傳教士麥都思

¹² 參見高美芸：〈王韜對時代的關懷及其尋求的解決之道〉（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民國92年7月），頁347-388。另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519-533，與高美芸的統計不甚相同，包括中文論文136篇、英文論文16篇、日文論文15篇。

¹³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九龍：中國學社，民國50年2月），頁45；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28。

¹⁴ 避居香港再改名韜，字仲弢、子潛，自號天南遁叟。50歲時（光緒3年，1877年），又曰弢園老民。參見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收在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近代文獻彙編第1期第8冊（臺北：世界書局，民國52年7月），頁5-10。

¹⁵ 王韜：〈王韜自傳之二—南天遁叟〉，收在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近代文獻彙編第1期第8冊，頁11。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等人。¹⁶次年遭父喪回里。後因生計支絀復隻身走滬濱，應麥都思之邀，擔任墨海書館的中文編輯，協助其翻譯《聖經》，並與著名數學家李善蘭，一起協助英國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等翻譯西方科技著作。他從事這一工作至同治元年 (1862) 止，先後長達十三年。此期間除幾次返回故鄉及遊覽之外，一直都居住在上海。¹⁷

王韜在上海的十多年間，正是太平天國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素懷大志的王韜，因見時局之不可為，曾數度上書江南有關當局，包括上海道吳煦、江蘇巡撫徐有壬，以至於兩江總督曾國藩，綜論中外局勢，臚陳應付方策。¹⁸咸豐 10 年 (1860) 太平天國李秀成部攻占蘇州至上海之間廣大的地區，他遂協助上海以西之諸翟地方當局組織民團抵禦太平軍。¹⁹

次年 3、4 月間，王韜應艾約瑟之邀，伴隨艾約瑟及一批傳教士到太平天國首都天京 (南京) 遊歷，此行結識一些太平天國的官員。同治元年 (1862 年 3 月)，王韜回鄉探母期間，太平天國駐蘇州守將逢天義劉肇均，收到署名「蘇福省黃畹蘭卿」的〈上逢天義劉肇均稟〉，²⁰建議忠王李秀成攻取上海之策，並主張與西人結好力爭武漢上游等。²¹不久，這份稟帖在上海附近王家寺太平軍的營壘，被清軍截獲，王韜從此被清廷列入通緝名冊。王韜回上海後幸得麥都思之子英國駐上海代理領事麥華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與傳教士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的協助，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躲藏 135 天 (約

¹⁶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p.13.

¹⁷ 呂實強：〈王韜評傳〉，《王韜傳記資料》，第 1 冊 (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 68 年 11 月)，頁 3；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 年第 2 期，頁 28。

¹⁸ 呂實強：〈王韜評傳〉，《王韜傳記資料》，第 1 冊，頁 3。

¹⁹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 年第 2 期，頁 28。

²⁰ 李景光：〈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幾個問題〉，《中國近代史》，1989 年第 10 期，頁 55；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 年第 2 期，頁 29。

²¹ 姚海奇：《王韜的政治思想》(臺北：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0 年 9 月)，頁 17；賴光臨：〈王韜的生平與著述〉，《王韜傳記資料》，第 1 冊，頁 15。

四個多月），清政府要求英國公使布魯斯（Sir Frederick Bruce）引渡王韜，雖然為布魯斯所拒絕，²²但王韜亦無法立足於上海，遂於同治元年（1862年10月）輾轉避禍於香港。²³

王韜在滬為西人傭書的十三年期間，除與西士往還，並參與基督教宣教工作。當時與王氏相交密切者，包括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龔孝拱等；他在書館的中國同事，以海寧李善蘭、寶山蔣劍人、江寧管小異、華亭郭友松等人為最著名，王韜亦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浸通曆算與西學。²⁴本期先後完成的著作有《瀛壖雜誌》、《蘅華館日記》（今名《王韜日記》）等書。²⁵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得知居滬期間王韜的民族思想以族類思想與忠君愛國思想兩方面為主。

一、夷夏之辨的族類思想

王韜在上海為傳教士工作期間，雖然了解不少西方事務，但心態上還是深受夷夏之辨的名教思想影響，認為替洋人工作，時命不濟不得安於現狀之故，嘗云「韜年十九，已事博涉，才雖不逮古人，而風雨一編，靡間晨夕，不可謂非劬書媚學者，初不料時命之不偶，而淪落於無知之俗也」；²⁶「韜逐臭海濱，為西人傭書，計非得已然，舍此無可適者」；²⁷「瀚自來上海，綿歷歲序，雖亦時命之限，初非意計所料，第事已至此，不得安之而已」。²⁸

²²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47.

²³ 王韜：〈與英國理雅各學士〉，《弢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2年影印光緒2年9月本），第6卷，頁16B；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28-29。

²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45。

²⁵ 〈王韜事蹟考略〉，《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頁62-64。

²⁶ 王韜：〈與所親楊茂才〉，《弢園尺牘》，第2卷，頁1B。

²⁷ 王韜：〈再寄孫惕菴〉，《弢園尺牘》，第2卷，頁21B。

²⁸ 王韜：《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頁65。該書前言謂，《王韜日記》原名《蘅華館日記》，上海圖書館藏有咸豐8年正月初一至同治元年12月8日的部分，臺灣藏有道光29年至咸豐5年的日記6冊。

如前所述，他何以會認為替洋人工作充滿了無奈呢？究其根本，應係認為「華洋有別」，這種認知在他的著作中多處可見，例如他的日記曾援引《左傳》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指稱西人在血緣上與我不同，而謂「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慮遠，其性外剛狠而內陰鷲」；也認為西洋的語言文化與中國亦大異其趣，謂「飲食者欲固不相通，語言動作尤不可苟。」²⁹所以，批評外國人是「（西人）...桀黠其天性然也，其律重商而輕士，喜富而惡貧，貴壯而賤老，厚妻子而薄父母，知俯育而不知仰事。」³⁰

除此之外，他也深深體認到中國的財力凋敝、民生貧困、國勢積弱，使得國人備受西方強權欺凌，並遭遇諸多不平的待遇，謂「（西人）待我華民甚薄，佣其家者，駕馭之如犬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見我文士亦藐視傲睨而不為禮，而華人猶為其所用者，雖迫於衣食計亦以見中國財力之凋敝，民生之竊蹙也。」

因此，王韜主張中外政治體制、文化風治、國勢強弱、民性民情皆不相同，中國必須嚴守夷夏之防、華洋之辨，否則可以預期的禍害必不能免。謂「中外異治，民俗異宜，強弱異勢，剛柔異性，潰彝夏之大防，為民心之蠱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³¹嚴夷夏之防的目的，是在洋強我弱的情況下，防止中國的變夏於夷，他認為「奈何欲以暫來之西人，易數千年之中國，用夏變夷則有之矣，未聞變於夷者也。」³²換言之，雖然他認為中國在國力上暫時趕不上外國，但在文化上，中國仍是富有文明的邦土，以華夏文明教化世界，才是數千年以來顛仆不變的真理，故而切不可使中國文化受到西人一時影響而產生質變。

²⁹ 王韜：《王韜日記》，頁65、83。

³⁰ 王韜：〈上徐中丞第二書〉，《弢園尺牘》，第4卷，頁20A。

³¹ 王韜：《王韜日記》，頁82。

³²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第7卷，頁10A。

二、忠君愛國思想

王韜早年與傳統儒者相同，秉持「王者無外」的天朝觀，其文化認同的對象是君主帝王。

鴉片戰爭後，清室內有太平天國的叛亂，外受西洋強權步步威逼，舉國內外干戈擾攘，王韜眼見國家的動盪不安，油然而生愛國的思想，並表現出捨我其誰、為天下先的心志，因此，他立志以「熟刺外事，宣揚國威」為職任。他這種忠君愛國的想法，係出於對文化中國的認同，屬於文化的民族思想之類。

咸豐8年（1858），王韜「為天下先」的雄心壯志益形堅定，嘗謂「噫！今日中原，豺虎縱橫，干戈擾攘，得享清福，領略閒趣者，能有幾人？能有幾處？思至此，不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³³「世事真難料，蒼生劫未終，借師目助順，飛炮善橫攻，嶺嶠鯨鯢奮，滇池豺虎雄，書生思報國，徒此抱孤忠」。³⁴

其次愛國心志，由〈粵逆崖略〉乙文亦隨處可見，曾云「弛忌諱之禁，寬指斥之誅，廣招徠之路，徵奇才異能之士，開直言極諫之科，務使箴闕失而絕頌諫，先空言而收實效，威以克愛，猛以濟寬，信以攻心，誠以勝詐，儉以革奢，靜以制動，如是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是固草莽忠海國羈臣所旦夕期望者也。蓋古之人雖伏處菰蘆，屏跡僻遠，而忠君愛國之念，未嘗一刻忘也……，我今日之所言，此心固耿耿如是也。」可見王韜心思所繫的除愛國心志外，也曾提出國家改革的具體方向。另，嘗云「將此蹈海孤臣一念，及此不禁太息痛哭流涕者也，憤懣鬱煩，致嬰心疾，……憂國念家，萬慮全集。」「韜所憾者生逢亂世，死被惡名，不能早自建立，以身殉國」，³⁵可見王韜的愛國心志是慷慨激昂，甚至可以以身殉國的。

³³ 王韜：《王韜日記》，頁39。

³⁴ 王韜：〈悔余隨筆〉，《王韜日記》，頁202。

³⁵ 王韜：〈與醒逋〉，〈答包苻洲明經書〉，《弢園尺牘》，第6卷，頁11A；第7卷，頁17A。

此外，從〈粵逆崖略〉乙文知道，王韜雖然常譏諷清廷的洋務改革，但終究其認同的對象還是清室。問題是既然認同清室，但他為何還會上書太平天國，以求仕用呢？這個問題學界至今尚未得到定論，如謝興堯〈王韜上書太平天國史事考〉的大作，認為上書的動機只是想出出風頭；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乙文，則主張上書的動機是想藉新朝以用世，一展他的抱負，但是他錯估太平天國的實力。³⁶

綜而言之，王韜所認同的族類是文化的中國，所強調華洋之辨，與孫中山的滿漢之別的內容不同，王韜主張嚴防的「夏變於夷」，意思是指華夏文化的西化。這個文化中國的看法，一直延續到他旅歐後所主張的「六合混一論」，這個「一」指的就是中國的人倫道統，這方面的討論，將另詳於下節。

王韜蟄居上海時期，雖以族類思想等較情緒化的反應看待華夷之別，但後來為外國傳教士工作假以時日之後，耳濡目染下，對西方的格致之學，態度上已漸呈變化，並改以理性欣羨西學的精妙。例如在天文算學方面，他就承認「西人精於中士十倍」。爾後，且同意西夷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夷狄，故不能再視西方思想是洪水猛獸而一味排拒，進一步主張開放心胸以接受西學，他說「哲人取法於彝狄，孔子在四裔，亦視其法如何耳」，提出「和戎」之議，主張與西方各國「和平共處」。³⁷

一言以蔽之，王韜是持守中道又溫和虛心的儒者，所以他文字表達的愛國情操，雖然強烈，終究並未作出太過激烈的壯舉，如他自己所說「欲為祿仕以謀升斗，而疆場有事不得不供驅策，男兒以馬革裹屍，誠為壯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身許國，壯志漸消……。」³⁸其次，王韜早年雖然視洋人為異類，但並未主張與洋人對決，而採取兼容共蓄的態度，當其愛國的雄心消去之後，

³⁶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69年6月），頁353-355。

³⁷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57-358。

³⁸ 王韜：〈再寄孫惕菴〉，《弢園尺牘》，第2卷，頁21B。

改由理性的「熟刺外事，宣揚國威」作為他報國的方式與日後努力的方向，這點主張可參見〈普法戰紀代序〉乙文所稱數語：「王君旅寄香海，一星將終，雖處菰蘆，流離僻遠而忠君愛國之念，未嘗一刻忘，恆思得當以報國家。嘗曰：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此羈臣之職也。」³⁹

叁、寓港旅英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

同治元年，王韜初至香港，⁴⁰經英傳教士麥都思介紹，受聘於英華書院（Ying Hua College）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從此爾後二十年間，王韜一面協助理雅各完成翻譯儒家經籍的工作，向西方傳布中國文化。另方面，創辦《循環日報》，宣傳其維新變法與自強思想，成為近代中國報刊政論文字的鼻祖，⁴¹奠定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咸豐11年（1861），理雅各已經先後出版過英文版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書，後來他計劃將儒家經典全部譯成英文，並出版28卷《中國經書》（The Chinese Classics）。理雅各邀請王韜加入譯經行列後，王韜協助其譯書長達十餘年。經王韜協助，順利譯成的經書有《書經》、《詩經》、《易經》、《禮記》等，分別列為《中國經書》的第三、四、二十六至二十八卷，是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盛事。同時，王韜為了準確的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曾潛心研究儒家經籍，著有《皇清經解札記》24卷、《春

³⁹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頁91。

⁴⁰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29，謂王韜於1862年10月4日到達香港。

⁴¹ 劉學照：〈論洋務政論家王韜〉，《中國近代史》，1983年第4期，頁69。相對於中國而言，這段期間（自咸豐10年12月（1861）清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始，至光緒20年（1894）中日戰爭發生之間）正處於史家所稱「西法模仿時代」或「自強運動時期」，此時的清政府積極從事於「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自強事業，以力圖增進中國的富與強。

秋左氏傳集釋》60卷、《春秋朔閏考》3卷、《周易集釋》、《毛詩集釋》等。⁴²

同治6年（1867），理雅各因事返回英倫，為繼續中國經籍的翻譯工作，同年12月理雅各致書王韜，請其赴英以繼續助譯工作。王氏遂啓程，隻身前往，旅居英倫二年餘。同治9年（1870）二月，返回香港。⁴³王韜留英助譯經典期間，嘗赴牛津大學演講中西的交流。自英歸港途中，並順道行經巴黎訪問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此番西行經歷，不但使王韜的見聞大增，亦使中國傳統學術傳播於歐西諸國。⁴⁴

自英返港後，次年歐洲爆發普法戰事（1871年），王韜即撰《普法戰紀》以記其事，刊行後佳評雲集，朝廷重臣如李鴻章與丁日昌等，對該書大為稱許，王韜也因此受到日本學者的重視與推崇。⁴⁵同年，他與黃勝共同買下理雅各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創辦「中華印務總局」，從事出版事業。同治12年（1873）創刊《循環日報》，王韜自任主筆。⁴⁶該報以鼓吹維新變法為主旨，屬於清末少數的新聞報刊之一，透過該報專欄—「中外新聞」，王韜取得議論時政、介紹西學、抨擊時弊、鼓吹變法的筆耕園地，奠定了他在新聞報刊政論史上的先驅地位，並享有盛名。⁴⁷

藉由《循環日報》，王韜反覆宣傳「變法圖強」言論，對近代中國影響至深且鉅。其餘的洋務人士如鄭觀應等，亦先後於澳門、上海各地，提出變法主張，與王韜維新思想相呼應，康有為等維新派的主張，亦曾受王韜思想的啓

⁴²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29。

⁴³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收在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頁7。

⁴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民國50年2月），頁53。

⁴⁵ 呂實強：〈王韜評傳〉，《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頁5-6；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收在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頁8。

⁴⁶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收在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頁8。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29，稱《循環日報》創刊於1874年1月5日。

⁴⁷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30。

發。⁴⁸

光緒5年（1879），王韜應日人重野成齋等人之邀，作扶桑之旅凡三月餘。光緒8年（1882）王韜將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立論精華結集成冊，出版了《弢園文錄外編》乙書。⁴⁹光緒10年（1884），王韜始返回上海定居。

誠如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乙文所稱「王韜思想的轉變，主要就是在寓港及旅英時期」。⁵⁰這個時期的王韜，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業已跳脫狹義種族主義，改以爭取司法、經濟主權為主要訴求。隨著他主權民族主義思想的建立，繼而提出民權思想，主張重視民意，認為中國應該模仿英國採取君主立憲政體，相信在歷史的循環定律下，至終世界六合將會混同為一。雖然他未曾明言混同於如何形式之下，但言下之意，頗有萬國將歸於大一統中國文化之意，也就是說，他的世界觀終極目標是統一於中華文化。

因此，本節將以「主權論」、「商力說」、「重民說」、「文化混同的世界觀」等方面，說明他民族主義思想的特點。

一、「主權論」的提出

王韜為我國倡行主權民族主義之先導。同治3年（1864）王韜上書李鴻章時，主張「握利權」、「樹國威」為外交交涉綱領。光緒年間，主張收回喪失之主權，認為「我之所宜與西國爭者，額外權利一款耳」，強調「我之爭額外權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衝於壇坫之間，雍容於敦槃之會」。依他之見，收回主權「要在執行西律，以與之反覆辯論」，「以其矛盾

⁴⁸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54-60。

⁴⁹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頁30。

⁵⁰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民國78年6月），頁227。

其盾也」。因此，王韜所論列的主權，僅及於司法權（領事裁判權）、經濟權兩者，⁵¹其司法權的民族主義，又以設領事與額外權利的兩項議題為其意理。

（一）設領事

王韜主張師夷之長技，其外交主張與郭嵩燾相近，持和夷策略。認為清廷採取的馭外之法（外交策略），以簡公使，設領事二者，作為達成洞達洋務，宣揚國威的目的。對於列強，王韜認為英、法兩國最為雄鷲，而法國舉動係以英國為樞紐，故馭外之術應專注於英國。⁵²

他主張設領事的原因，是「按歐洲諸國之例，凡他國商民行賈於其國中者，犯事則歸其國懲辦，華民在外國無政府可以保護。然不能視同己國之民也，獨於華民，一若私為己有……」⁵³等，故中國應立即設領事。

至於設領事目的、任務則是「領事於此宣揚聖德，鋪張王靈，能為之保佑而維持之。」⁵⁴「領事則保衛商賈，護持貿易，有事據公法和約為辦理，或有不行，則稟陳己國使臣，或轉請之外部大臣，以俟裁決，……惟是保商賈，興貿易者，固使臣領事也」。⁵⁵

除設領事統馭遠裔之外，即是「然當斯任者則甚難也，其在東南洋各島者，既不盡歸我國領事所約束，而其傭於異域者，身在檻井，欲贖而脫其繫，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則領事之設，亦惟虛位備員而已」。「西法之訟獄之事西官聽之，雖設領事豈能為袒護」，所以還要從法律著手，以改變中外間的不平等地位，曾謂：「泰西諸邦通於吾中土者，未必盡強國，……而每遇事

⁵¹ 瞿立鶴：〈近百年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之起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8編近代思潮，頁359-361。

⁵²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頁233。

⁵³ 王韜：〈保遠民〉，《弢園文錄外編》，第3卷，頁10A。

⁵⁴ 王韜：〈呂宋島設立領事議〉，《弢園文錄外編》，第12卷，頁7A。

⁵⁵ 王韜：〈使才〉，《皇朝蓄艾文編》（臺北：學生書局，民國54年），第12卷官制，頁4A-4B。

故輒作飛揚跋扈狀，……英德俄普澳領事之權，幾與公使等，凡有所請，無不曲從，……其所謂入國問禁者無有也，惟徑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嘗能加於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則曰彼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至於我國之領事「即無利權又無兵威」，使得「西人至中國，則稱之為彼國之商，貴逾上賓，華人至西國，則比之於己國之民，賤等僕隸，積重難返，無可挽回，有心人每論及此，無不吁嗟太息。」⁵⁶所以他又進一步提出收回我國的領事裁判權的主張，他說：「有事宜歸兩國朝廷秉公裁斷，則釁自無從起矣，今欲永與中國和好，莫如收拾各處領事額外之權。」⁵⁷

(二)「額外權利」與國家主權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乙文，認為「額外權利」名詞是王韜所創，他把外國所獲得中國一切侵及主權部分的特權，都視為額外權利，認為必須用武力方式向列強爭回。此名詞已清楚的代表其主權觀念的含義，可視為王韜的近代民族主義觀念的代表。⁵⁸然詳細考察王韜的著作，可知所謂「額外權利」指的是「領事額外權利」，⁵⁹即領事裁判權或治外法權，是項法權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中文裡初無專有名詞以稱之，王韜是最早為該項權利命名的學者，其後黃遵憲改用「治外法權」一詞，並成為中文通用的標準名詞。⁶⁰

王韜認為「夫額外權利，不行於歐洲，而獨行於土耳其、日本與我中國，如是則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傳道之士，旅處之官，苟或有事我國悉無權治之」。⁶¹論其弊害云：「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西

⁵⁶ 王韜：〈設官泰西下〉，《皇朝蓄艾文編》，第12卷官制，頁3B-4 A。

⁵⁷ 王韜：〈英待中國意見之不同〉，《弢園文錄外編》，第55卷，頁16B。

⁵⁸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212。

⁵⁹ 王韜：〈英重通商〉，《皇朝蓄艾文編》，第28卷，頁3B。

⁶⁰ 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第11冊（臺北：南天書局，民國76年9月），頁208。

⁶¹ 王韜：〈除額外權利〉，《皇朝蓄艾文編》，第55卷，交涉二，頁13A-13B。

廷以中國鞠案動用刑罰，是以此例不行，據煙臺和約，自後中西商民爭訟，交被告人官員辦理，如西人控華人則歸華官，華人控西人則歸西官，……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鞠案，涉訟之民難保無怨聲。」⁶²所以他說廢除領事裁判權係發自愛國忠君的熱忱，是我國官民必爭的權益，在所著〈除額外權利〉乙文中，謂「此我國官民，在所必爭，乃發自忠君愛國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⁶³

廢除領事裁判權的問題，王韜認為不單是中國人的願望，早在1869年英國駐京公使阿利國（Rutherford Alcock）寄書外部大臣時，即曾為永保其貿易利權，提出「請盡禁鴉片，而傳教人勿入內地居住，刪除領事額外權利，以冀貿易之局可持永久」的建議，其說雖下廷議，卒因英國內部意見不一，或不願中國生事，而未實行。王韜認為如果依照阿利國的意見，等於給予中國以俄、美等國相同的待遇，也等於將中國納入萬國公法（即國際法）的規定，此舉必撓泰西列國的疵議，是故英國之議者，率弗喜之。⁶⁴

對於萬國公法，王韜的看法為「試觀萬國公法一書，乃泰西之所以聯與國，結鄰邦，俾眾咸遵其約束者」，認為萬國公法雖有其缺失而不足恃，因云：「俄邀諸國公議行陣交戰之事，而英不赴，俄卒無如何，此蓋國強則公法我得而廢之，亦得而興之，國弱則我欲用公法而為我用，嗚呼！處今之世，兩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強。」⁶⁵但以中國當時之地位，較納入萬國公法之內者更不及，故他除了主張廢除領事裁判權外，並致力於將中國納入「萬國公法」，以謀求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

論及爭取額外權利的方法，王韜認為不必經由戰爭手段，僅藉由外交交涉與談判即可達成，謂「我之所宜與西國爭者，額外權利一款耳，蓋『國家之權』繫於是也，此後日仁人傑士之所宜用心也，……夫我之欲爭額外權利者，

⁶² 王韜：〈治中〉，《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5B-26A。

⁶³ 王韜：〈除額外權利〉，《皇朝蓄艾文編》，第55卷，交涉二，頁13B。

⁶⁴ 王韜：〈英重通商〉，《皇朝蓄艾文編》，第28卷，頁3A-3B。

⁶⁵ 王韜：〈洋務上〉，《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3。

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衝於壇坫之間，雍容於敦槃之會而已，……而要在執持西律，以與之反覆辯論」。

我們應注意的是，王韜所稱額外權利或主權，應是指兩種概念，如他曾說：「蓋加稅一款，乃『我國家自有之權』，或加或減，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強與爭也。」⁶⁶此處所稱「國家自有之權」，與前述「國家之權」皆係指國家主權意思，與王韜所說「額外權利」所指之權利是有明確的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的。王韜曾明晰的說明，國之主權乃是「如有大事，則當以國體爭之，如更定釐稅，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鄰國之所宜預聞，其重輕所繫，斟酌盡善，國家當自具權衡，……若事事由西人挾制其間，委曲相從，則國不可以為國矣。」⁶⁷

綜合上述說法，王韜所主張的主權民族主義，其定義是十分清楚的，首先是爭取中國的司法權、肯定國家主權；其次，主張藉由外交手段，不必用戰爭的手段，去爭取額外權利的廢除；並認為如此使中國終於可與各國永修邦誼，不再有所爭執，前述「有事宜歸兩國朝廷秉公裁斷，則釁自無從起矣，今欲永與中國和好，莫如收拾各處領事額外之權」，正是這個意思。

二、商力說

自歐返港後的王韜，針對時事所提出的言論，經常是以「兵力」與「商力」相提並論的，也就是說他認為「泰西諸國以通商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商力富則兵力裕，故商人於國中，可以操議事之權，而於外也，亦得割據土地，經營城邑。」⁶⁸「商富即國富，……此西國所以恃商為國本」。⁶⁹

⁶⁶ 王韜：〈除額外權利〉，《皇朝蓄艾文編》，第55卷，頁13A-13B。

⁶⁷ 王韜：〈辦理洋務在得人〉，《弢園文錄外編》，第3卷，頁25A。

⁶⁸ 王韜：〈遣使〉，《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5B。

⁶⁹ 王韜：〈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皇朝蓄艾文編》，第1卷，通論一，頁26B-27A。

若中國不及時發展商力，則軍事改革費用之高將使朝廷財源無以為繼。因此，可將王韜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張稱為商力說。

王韜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中，除在司法權上有所主張外，在經濟權上亦提出「握利權、樹國威」及「變法富強」兩項主張，這兩項主張也就是他的經濟民族主義的主要內涵。

(一) 握利權，樹國威

王韜在同治3年（1864）上李鴻章書中，提出「握利權」、「樹國威」兩概念作為其對外交涉綱領。⁷⁰他主張與外商爭利權的目的，也是為了能「握利權」。汪榮祖根據這些說法，認為王韜是「發出維護經濟主權的先聲，實與鄭觀應、康有為等商戰的觀念相互唱和」。⁷¹柯保安據此認為王韜已具有近代民族主義之色彩，而將王韜與鄭觀應並列，視為中國最早主張經濟民族主義的中國學者。⁷²

但當政者如何與西商競爭，奪回利權呢？王韜云：「中國商賈之道，實鮮善法，莫如仿西國法，設立公司，」表示他注意到西方商人的組織能力及經營流通的方法。以公司經營的方式而論，王韜認為「官辦不如商辦」，其原因是「中國地大物博，於地球四大洲中最高富強，特當軸者不能自握利權，自濬其利藪而亟為之興利焉耳。迂拘之士，動謂朝廷宜閉言利之門，而不尚理財之說」。⁷³此外，又因為西人經商，大半採取商辦方式，而中國官吏則向來抑損商人，且貪污嚴重。若是就中國當時的情形論，若是華商缺少政府為後盾，則無力與西商競爭，因此王韜雖不主張官府干涉商業，卻贊成政府保護中國商人，因為保護商人的政策，不但對商人有利，也對國家有利，於是「商富而後國富」。根據如此論點，汪榮祖研究認為王韜或晚清維新人士的經濟主張，不

⁷⁰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第7卷，頁7B。

⁷¹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75。

⁷² Paul A. Cohen,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 p.569.

⁷³ 王韜：〈興利〉，《弢園文錄外編》，第2卷，頁15B。

單只主張藏富於民，已更進一步地提出「藏富於商」的主張。⁷⁴

(二)興利除弊，以求變法富強

王韜認為要「發展商力」，必先掃除社會傳統輕視商人的態度，然後引介「興利」觀念，以謀國富民強。他宣稱泰西諸國往來首重通商，其商人不但受人尊敬，亦「可以操議事之權，而於外也，亦得以割據土地經營城邑」。王韜所謂「發展商力」指的是發展國際貿易，稱「古之為商，僅遍於國中；今之為商，必越乎境外」，越乎境外的意思就是指從事國際貿易，王韜以為惟有如此，方能興大利、賺大錢。總之，這點與馮桂芬所主張以汽船從事之江河貿易，氣魄上已更勝一籌。⁷⁵

興利、除弊是國家富強的一體之兩面，興利之前必先盡除積弊，方能使大利順利產生。王韜的〈除弊篇〉指出，中國時弊即「中國所宜變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練兵也，曰弼教也，曰明刑也，然此四者之外，……當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一曰裁冗員，……一曰安置旗民，……一曰廢河工，……一曰捐妄費，……一曰撤釐金，……諸弊既除，百利乃興。」⁷⁶而所應當興利者為何？王韜撰〈論宜興製造以廣貿易〉乙文，主張的工商並重、振興製造業，即其與西商爭奪利權的手段之一。⁷⁷並且，主張注重開發礦產、興築鐵路，〈興利〉乙文云：「蓋富強即治之本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利之最先者曰開礦，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鐵之利，……一曰掘煤之利，……一曰開五金之利；其次曰織絨之利，織絨必以機器為先；此外則一曰造船之利，令民間自立公司，購置輪船以往來內河，……而遠至於外洋，載運各貨，以貿易於歐洲各國，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興築輪車鐵路利，……自有輪車而遠近相通，可以互為聯絡，不獨利商，並且利國。」⁷⁸可見得，王

⁷⁴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75。

⁷⁵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74。

⁷⁶ 王韜：〈除弊〉，《皇朝蓄艾文編》，第1卷，通論一，頁17B-18A。

⁷⁷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75-376。

⁷⁸ 王韜：〈興利〉，《弢園文錄外編》，第2卷，頁16。

韜不但已注意經濟上路權、礦權與航權的問題，更主張從振興路、礦、航運三方面著手，達成爲國興利的目的。

當然，經濟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的目的，係以富國馭外，故而王韜提出使中國富強方法中，有六項當務之急，即「講求武備，整頓海防，慎固守禦，改易營制，習練兵士，精製器械，此六者實為當務之急」。再者要使「文武兩途，皆當變通，悉更舊制，否則人才不生」；並且要「裕財用，如開礦鑄銀尚機器，行紡織通商於遠，許貿易於國中者，皆得以輪舶，而以火輪、鐵路、電氣通標，亦無不自我而為之，凡泰西諸國之所眈眈注視，躍躍欲試者，一旦我盡舉而次第行之，俾彼所覬覦，艷羨其間，此即強中以馭外之法」。⁷⁹以上即王韜經濟民族主義的要義。

三、「重民」說

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中，常有民族民權共生的特質。換言之，民族主義係對外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民權主義則對內運用民主方法以創造富強之局，反之亦然，一面國內內政富強，一面在對外時才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局面。王韜亦把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實行西方先進民主政治結合一起，作為富國強兵的根本措施。

(一)民有民治與民享

王韜認為治內以重民爲本，曾謂：「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今中國之民生齒日繁，幾不下三千餘兆。誠使善為維持，而聯絡之，實可無敵於天下。……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⁸⁰得民心的方法，王韜的看法是「治民之要，在撫字以結心，勇敢以作其氣，忠孝節義以厲其心志，輕徭薄賦以養其身家，務使安其居樂其業，可靜而不可動，而忠君愛

⁷⁹ 王韜：〈變法自強上〉，《弢園文錄外編》，第2卷，頁5B。

⁸⁰ 王韜：〈重民上〉，《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17A。

國之心，自油然而生於其中」。⁸¹甚至應該「要令富民出其貲，貧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賢愚同奮，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則古者與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夫能與民同其利者，民必與上同其害；與民共其樂者，民必與上共其憂」，⁸²此處所稱與民共治，與民同利，與民共其樂，實已寓有現代民主政治下民有、民治、民享等主張的意涵。

(二)主張君民同治的君主立憲制

王韜主張變法，不僅在經濟上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而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君主專制，實行君主立憲的議院制。他把當時的西方國家分爲「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三類，其定義爲：「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⁸³認爲在以上三者中，以君民共治之體制有三代之遺意，云「論者謂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壹，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⁸⁴換言之，王韜認爲惟君民共主的體制，符合中庸之道，也能內外兼治，云：「試觀泰西各國，凡其駸駸日盛，財用充足，兵力雄強者，類皆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為，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⁸⁵他雖未公開鼓吹君主立

⁸¹ 王韜：〈重民中〉，《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0A。

⁸² 王韜：〈重民中〉，《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1A。

⁸³ 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1B-22A。

⁸⁴ 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2A；朱英：〈中國近代最早提出「變法」口號的思想家—王韜〉，《中國近代史》，1983年第1期，頁86。

⁸⁵ 王韜：〈達民情〉，《弢園文錄外編》，第3卷，頁7B。

憲，但認為君民共治的議院政治，是富國強兵的根本。⁸⁶

在君民共治的國家之中，王韜最仰慕的是英國，謂「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導之，順民之志而通之，……其善於治民者莫如英」。⁸⁷其〈紀英國政治〉乙文云：「英國僻在海外，屹然三島，峙於歐洲西北，形勢之雄為歐洲諸國冠，……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⁸⁸王韜之所以如此推崇英國，一方面是因為英國當時的國勢最強，一方面也可能與他較瞭解英國國情有關係。

此外，王韜亦注意新興之立憲君主國—日本。「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不數年間，竟能自造船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無不改而從之」，⁸⁹認為「日本之效西法，雖僅其一二，而軍艦可自駕駛也，鎗砲可自製造也，陸軍水師，皆能以西法演練，……夫中國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與不能之間而已。」⁹⁰又謂「日本與米部通商僅七八年耳，而於鎗砲、舟車、機器諸事，皆能構製，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國，堂堂天朝，豈反不如東瀛一島國哉？」⁹¹證諸史實，光緒20年甲午之戰，中國果然是以堂堂天朝之尊，敗給日本島國，誠如王韜所謂「中國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堂堂天朝，真反不如東瀛島國。

雖然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乙文，認為王韜之主張設立議院，主要在求為上者能下接輿情，其贊成英國議院的政體，基本上係受中國傳統影

⁸⁶ 張海林：〈論王韜的危機意識和政治改革思想〉，《中國近代史》，1993年第4期，頁112-113。

⁸⁷ 王韜：〈上當路論時務書〉，收在楊家駱主編：《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1冊（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2年），頁149。

⁸⁸ 王韜：〈紀英國政治〉，《弢園文錄外編》，第60卷，頁34B-35A。

⁸⁹ 王韜：〈變法自強下〉，《皇朝蓄艾文編》，第1卷，通論一，頁13B。

⁹⁰ 王韜：〈西人重日輕華〉，《皇朝蓄艾文編》，第61卷，外史二，頁2A-3B。

⁹¹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第7卷，頁3B。

響，非關乎代議政治的主權分享、全體參與等政治意涵；至於他的治民之法與重民之說，也是儒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觀念之重申與強調耳。⁹²但根據王韜所處的時代來說，他能有如此的體會，誠屬難能可貴，其對於時代觀念的啓發，可能更重於學理上的完備，至少他已注意到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止是軍事上的富與強，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所以他在民權與民族共生的現象上，也還是有他的貢獻存在。

四、文化混同的世界觀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產生，係來自西力衝擊。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清帝國有識的滿漢高級官員及知識分子之中，如恭親王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馮桂芬、薛福成等，均表現出注重文化觀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因受鴉片戰敗以來，國家不斷對外失利的影響，決心努力自強。這批自強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者的共識，認為當時社會正處於自古以來未有的一大變局，決心因應時勢，拋棄過去在民族思想上的妄自尊大的天朝觀念，而推陳出新的學習西洋的長處。⁹³

處在如此的時代機制之下，王韜提出了新的文化民族主義。王韜的文化觀應先自所謂變局的觀念來進行討論。王韜認為當時西力之入侵，是天心示變的徵兆（天心即指時勢所趨），並認為是「三千年以來，至此不得不變」之局，云「天心變於上，則人事變於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⁹⁴他能認識到世變之極，故而亦提出應變之方法，曾謂「窮則變，

⁹²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頁88-89。

⁹³ 李國祁：〈滿清的認同與否定〉，《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頁100。

⁹⁴ 王韜：〈變法上〉，《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12B。

變則通，自強之道在是，非胥中國而夷狄也，統地球之南朔東西，將合而為一，然後世變乃極」，⁹⁵以為國家的興衰存亡關鍵，端視該國是否能默察「天心」以應變，能應變者興，不變者衰，而因應世變的方法即是變法以維新。王韜的「應變者興，不變者衰」的說法，正可說明歷史興亡強弱的循環，汪榮祖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循環論思想。⁹⁶至於因應世變的方法乃是師其長技，認為「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故水必以輪舟，陸必以火車，捷必以電線，然後全地球可合為一家」。⁹⁷

他不但觀察到時勢之變，由於受到西學影響其世界觀的視野擴及全球，而不僅限於中國一國。他自述云：「大地如球之說，始自有明，由利馬竇入中國，其說頗為疇人家言，……而其圖遂流傳世間，覽者乃知中國九州之外尚有九州。」⁹⁸其所稱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即說明其中國中心論的突破，在西學的啟發下，始知中國不過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地位平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天朝」。

他認為世界最終將發展成為「混同萬法」的世界，並用「大同」來描述的世界秩序，如謂：「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混同萬國之法物，此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此之謂大同。」⁹⁹其〈六合將混為一〉乙編，「上下四方謂之六合，是統地球言之，雖同在覆載之中，地有山河之險，人有

⁹⁵ 王韜：〈答包苻洲明經書〉，《弢園尺牘》，第7卷，頁17B-18A。

⁹⁶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367-368。吳雁南：〈王韜的變法維新思想與心學〉，《中國近代史》，1994年第2期，頁57，謂王韜變法維新思想形成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他係代表官僚、地主和一部分商人向資產主義轉化的知識分子，而提出其變法維新的主張。

⁹⁷ 王韜：〈變法自強下〉，《弢園文錄外編》，第2卷，頁13A。

⁹⁸ 王韜：〈地球圖跋〉，《皇朝蓄艾文編》，第47卷，地學二，頁1。

⁹⁹ 王韜：〈原道〉，《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2A-2B。

良頑之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各安其政，悅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之者也，然道有盈虧，勢有分合，今者中外和好，幾若合為一家，凡有所為，必準萬國公法，……一旦聖人出而四海一也，……故謂六合將混而為一。」¹⁰⁰

雖然王韜認為世變是必然的，云：「巢燧羲軒，開闢草昧，則為創制之天下，唐虞繼統，號曰中天，則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來，至秦而一變，漢唐以來，至今日而又一變，……而孔子之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¹⁰¹但變世中也有不變者，其不變者一是人倫之道，一是中國的仁義道統。人倫之道方面，認為「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故吾向者曾謂數百年之後，道必大同，蓋天既合，地球之南，朔東西而歸於一天，亦必化天下諸教之異同而歸於一源」。¹⁰²仁義道統方面，王韜在〈天命不可妄干〉乙文謂「我國家龍興遼審，承統中華」。¹⁰³「自古仁義為國，其敝也衰，甲兵為國，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諸國其興勃然，而亡亦忽焉，……就在中國而觀，商之鬼方，……其種類或存或亡，而所謂中者，數千年以來如故。」¹⁰⁴「正統所歸」盛衰之勢，強弱之形「報應之理，有若循環」。¹⁰⁵〈中國自有常尊〉乙文，謂「中國天下之首也，尊無異尚，此古今之通義」、「知中國有時而弱，然弱亦足以久存，中國未常無衰，然衰要有終極，蓋彝倫所繫，統紀所存」。

王韜早年主張的文化民族主義，係以「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為核心，是「王者無外」的「天朝觀念」為主，在這種天朝觀念下，中國即天下之中，至終以文化「大一統」的普世主義為理想。¹⁰⁶但在其器識漸增之後，

¹⁰⁰ 王韜：〈六合將混為一〉，《皇朝蓄艾文編》，第61卷，頁3A-4A。

¹⁰¹ 王韜：〈變法上〉，《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10A。

¹⁰² 王韜：〈變法上〉，《弢園文錄外編》，第1卷，頁12B。

¹⁰³ 王韜：〈天命不可妄干〉，《弢園文錄外編》，第5卷，頁20A。

¹⁰⁴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第7卷，頁9B。

¹⁰⁵ 王韜：〈中國自有常尊〉，《弢園文錄外編》，第5卷，頁18B-19B。

¹⁰⁶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頁210-211；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一八九六至一九〇七〉，《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頁109-110。

他的文化民族主義內涵已有所不同，他在這個時期因器識的擴展，對於國家或是文化的認同上，已不再視中國文化為最優秀，亦不再認為是天下之中心的天朝，而知中國九州之外尚有九州，甚至認為中國地位尚不及萬國公法之各國。在文化上同時尊重東方或西方的聖人與道理，不再視西洋人為文化上的夷人。不過，相信世界至終仍是統一於中國的文化人倫之下。因此柯保安批評王韜的大同思想，認為他與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比較起來，王韜未能將人類整體的進步觀，置於其理想世界中，且他的大同觀念有很明顯的階級取向（*hierarchical orientation*），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仍是高高在上的，是優於他國文化的，在王韜的觀念中，一旦西方失去其強勢地位，諸道仍將歸於中國文化之下。¹⁰⁷因此王韜所謂的六合將混而為一，此一係指中國文化的道統。

肆、晚年返滬時期與世變

王韜年57歲時（1884）重返上海故居。他離港返滬後定居於淞北，初期擔任《申報》編輯，並完成《淞隱漫錄》乙書。光緒12年時被推舉為格致書院院長，次年完成《淞濱瑣話》，但此後王韜似為疾病所困而著述較少。光緒15年集成《春秋日食辨正》等，總其名為《經學輯存》。又一年完成《西學源流考》，總其名為《西學輯存》。光緒23年（1897）卒於上海，享年71歲。¹⁰⁸

由於王韜心存濟世之學，與西方人士往來密切，曾親蒞歐西各國潛心考察，又與國內推行洋務之人士，如丁日昌、容闈早有交遊，故能洞悉內外時勢，論述洋務、變法自能得其竅要切實方略。¹⁰⁹他在返回上海定居的十幾年間，仍陸續在報刊與致友人函牘中，論說關於變法自強的議題，並很快地成為

¹⁰⁷ 柯保安：〈王韜對變動世界的體察〉，《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頁102-103。

¹⁰⁸ 增田涉：〈王韜試論〉，《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頁119；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66-67。

¹⁰⁹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62。

上海附近傾向改革人物的中心。甚至有一說認為，當光緒19年（1893）時，主張改革的孫中山曾由廣東往北京，試圖上書李鴻章，敦請清室改革政治，途經上海，在鄭觀應家中遇見王韜，而王韜曾為孫中山修書，向李鴻章幕友羅豐祿推薦。¹¹⁰由此事可知，王韜與當時改革派人物頗有交流，孫中山似乎也曾受到王韜的影響與啓發。

甲午戰敗，王韜心情沈重。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出版格致書院癸巳年課藝序文中，王韜表示：「每聽北方來人談及戰事失利，即感憤怒而皆裂髮指，乃至於痛哭流涕，嘆息不能自己，而今議和已定，惟有亟圖整頓，痛除積弊，庶幾可再復中興，而我個人老病困頓，惟望英賢繼起，以冀一洗此恥。」光緒22年（1896）萬國公報主筆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編輯《中東戰紀本末》記敘與檢討中日甲午之戰將行出版時，王韜為之序，再度呼籲中國力圖振作，變法自強，切記以堂堂絕大的中國敗予蕞爾日本小邦之恥，踔厲奮發，力求上進，以待他日能轉敗為勝。¹¹¹雖然王韜未能親見康梁師生所推動的維新變法運動，及孫中山領導革命運動的進行，但他在清末所不斷發出的呼籲中，可知他察覺出時代已到達如他所謂的不得不變之局了。

伍、結語

美國學者柯保安認為王韜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先導人物之一，是受到以下三項因素影響而得：一是因為長時間居住於上海、香港，接受外國法律的保護，故而得以擺脫中國內地的傳統與文化之束縛，有較大的揮灑空間。二受惠於西方傳教士的提攜，較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機會，得以深入接觸了解西方的社會與文化。三因王韜置身於中國官僚體系之外，可以不受保守勢力的侷限與影響，而其民族主義思想主要內涵，即建構於對官僚體系的

¹¹⁰ 熊秉純：〈王韜研究〉，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8年6月，頁122-125。

¹¹¹ 陸寶千：〈王韜〉，《王韜傳記資料》，第2冊，頁29-30。

批判之上。¹¹²此外，王韜個人的卓越才華、敏銳洞察力、愛國愛民的使命感，也是促使他成為影響時代的啓蒙人物的因素之一。他曾針對時代提出「黃曉上書」，旅歐後完成使他享譽國際的《普法戰紀》，並為《循環日報》執筆，議論時政，宣傳變法思想。晚年主持《申報》筆政，與西人或維新派、洋務派或革命派人物，都有密切關係，影響時代思潮既深且遠。

王韜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承繼傳統儒家者，也有超越時人的卓越創見。其早年民族主義，受「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思想影響，與傳統儒者相同，持「王者無外」的「天朝觀」。但他接觸西方文化、器識漸宏之後，漸知中國的九州之外尚有九州，並體認到中國國際地位遠不及國萬國公法中的各國，開始主張以主權、商力、君主立憲等策略，振興國家民族地位。不過，最終他還是無法免俗，相信世界的未來是「六合混一」，在王韜的觀念中，認為一旦西方失去其強勢地位後，諸道仍將歸於中國文化之下。可見得他的民族主義，仍有其侷限，未能完全符合國際潮流與歷史的發展。但相較於清末其他啓蒙人物，如鄭觀應等後來在澳門與上海等地所提的主張，頗類似呼應著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的主張；維新派康有為等人變法之說深受王韜的影響；尤其王韜晚年返滬定居後，已儼然成為上海地區傾向改革者的中心，可見王韜仍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史上的時代先驅人物。

¹¹² Paul A. Cohen,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 p.573.

徵引書目

(一) 文集

王韜，《弢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2年影印光緒2年9月本。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

王韜，〈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變法自強下〉，《皇朝蓄艾文編》，第1卷通論一。臺北：學生書局，民國54年。

王韜，〈使才〉、〈設官泰西下〉，《皇朝蓄艾文編》，第12卷官制。

王韜，〈英重通商〉，《皇朝蓄艾文編》，第28卷。

王韜，〈地球圖跋〉，《皇朝蓄艾文編》，第47卷地學二。

王韜，〈除額外權利〉，《皇朝蓄艾文編》，第55卷。

王韜，〈六合將混爲一〉，《皇朝蓄艾文編》，第61卷。

王韜，〈西人重日輕華〉，《皇朝蓄艾文編》，第61卷，外史二。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8冊。臺北：世界書局，民國52年7月。

王韜，〈王韜自傳之二—南天遯叟〉，《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8冊。臺北：世界書局，民國52年7月。

王韜，〈上當路論時務書〉，收在《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1冊。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2年。

王韜，《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

(二) 專著

林啓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

姚奇海，《王韜的政治思想》。臺北：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0年9月。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九龍：中國學社，民國50年2月。

費正清等，《劍橋中國史》，第11冊。臺北：南天書局，民國76年9月。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三) 論文

〈王韜事蹟考略〉，《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71年3刷。

朱英，〈中國近代最早提出「變法」口號的思想家—王韜〉，《中國近代史》，1983年第4期。

朱宏源，〈從族國至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第30卷第2期（1992年6月）。

吳雁南，〈王韜的變法維新思想與心學〉，《中國近代史》，1994年第2期。

呂實強，〈王韜評傳〉，《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71年3版。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民國78年6月）。

李國祁，〈滿清認同與否定〉，《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

- 李景光，〈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幾個問題〉，《中國近代史》，1989年10期。
- 汪榮祖，〈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69年6月。
- 忻平，〈中國最早提出君主立憲制的是王韜〉，《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1983年第6期。
- 柯保安，〈王韜對變動世界的體察〉，《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69年6月。
- 高美芸，〈王韜對時代的關懷及其尋求的解決之道〉。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民國92年7月。
- 張海林，〈論王韜的危機意識和政治改革思想〉，《中國近代史》，1993年第4期。
- 郭漢民，〈王韜與香港〉，《中國近代史》，1998年第2期。
- 陸寶千，〈王韜〉，《王韜傳記資料》，第2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 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1896至1907年〉，《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69年6月。
- 熊秉純，〈王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8年6月。
- 劉學照，〈論洋務政論家王韜〉，《中國近代史》，1983年第4期。
- 增田涉，〈王韜試論〉，《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 賴光臨，〈王韜的生平與著述〉，《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 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之研究〉，《王韜傳記資料》，第1冊。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
- 瞿立鶴，〈近百年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之起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

集》，第18編近代思潮。臺北：臺灣商務書館，民國75年5月。

Paul A. Cohen,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4, August 1967.